

序言 走进杰克的世界

——虚构的采访

《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与罗尔斯

英语圈的《七武士》

川本：罗尔斯先生，初次见到您，请允许我怀着发自内心的亲切感称您为杰克。二十年前，我拜读了您的《正义论》同时，也得知您这本书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您一面倾听人们诉说社会的不公平，一面以专业理论为基础，想要从正面去论述《正当的社会》的构成。我被您的激动人心的理论所深深地感动，从而也使我拼命地准备基本的文献和相关资料。那些说话不好听的朋友们戏称我为“日本首屈一指的罗尔斯”。这次，决定由我承担《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的思想家传记中的罗尔斯卷和整理收集您的有关材料。请允许我关心一下关于您的一些内部消息，从而把我的日本读者引入到您的世界中。

实际上，在很早以前，日本的研究者们都纷纷涌入

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门下。当他被问到“老师您在读谁的书？”的时候，他坦然地说：“只读我自己的书。”这件事被传为佳话。从海德格尔的回答来看，真不愧是伟大的海德格尔老师。当然，这里既有对他赞美的一面，也有对他嘲笑的一面。今天虽然是直接向您发问，但我不打算向您提出像这样的不合适的问题。拜托您了！

罗尔斯：请您提问。请问您这个传记是怎样计划的？

川本打算写成一册书去记述“思想家及其思想的全部”。全部人物有三十位。也许这本身就反映了日本翻译文化的偏颇之处。美国思想家只有蒯因、库恩和您。加上英国出身的怀特海，还有从奥地利移居英国的波普和维特根斯坦。此外，还有在美国寻求避难并在美国去世的阿伦特，英语圈的思想家共计七人。

罗尔斯可称为是黑泽先生导演的电影《七武士》。把我们七人和这样的豪杰集团相提并论，确实使我感到很荣耀。这个阵容中，对我有直接影响的只有蒯因先生。他是一流的实用主义者，也就是从他的“知性的网络理论”中受到启发，才有了我的“反思的均衡”这一伦理学方法论。另外，是维特根斯坦。我在学习哲学时曾经从马尔科姆老师那里得到诸多指导，所以他被称为师匠的师匠。而且我的《两个规则的概念》这篇论文，如果不是拜读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也就不可能完成。

此外，稍微有些关联的，我想是波普和阿伦特。在

我的博士论文中参照了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和《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这两篇论文。在我的《宪法上的自由和正义的概念》（1963年这篇论文中借用了“开放的社会”这一用语。对我而言这是实现了“正义的两个原则”的理想社会。还有阿伦特的《人的条件》，是一篇对政治思想史家波库克命名的“公民的人道主义”——其理论渊源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作为公民，通过积极地参与政治从而完成个人的人格”这一思想——做了精辟描述的杰作。然而这种人道主义现在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一种触及“美好人生”的内涵的“整合的世界观”而与我的“政治构想”的出发点却不同。

迪内特编写的《哲学辞典》

川本：在您的第二册书的注解中，还可以看到一些不太认同阿伦特的观点的议论。二位都同样使用了“多数性”和“政治性事物”这一关键性概念，但互不言及对方。对此，我曾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阿伦特对于您是如何评价的，我倒是很感兴趣。在当今的政治思想界，阿伦特—文艺复兴运动正处在高潮，正因为如此，我期待着谁能够调查一下（她对您的评价）。另外，我想您一定记得您与丹尼尔·迪内特这样破格的哲学家所编写的那部《哲学辞典》吧。

罗尔斯：记得，记得。这是一本将现代的哲学家、思想家的名字变为普通名词、动词、形容词，并使其富有讽刺意味的小册子。在学生运动处于最高潮的1969年，研究生、青年研究者的先锋派们为了嘲讽那

些学究式的权威主义而出版的。此书刚刚出版，就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欢迎。最后由美国哲学学会作为发行单位对本书进行销售。在 1987 年的第 8 版中把我的名字的词尾的“S”去掉而成为单数型的“罗尔”(rawl)这个名字。

川本 我也拜读了这个版本 因为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从而产生了将此书译成日文的滑稽想法。某大学的哲学研究室的有关人员也有这种想法并已着手实施 而且已有了会心之作。在酒席中 他们告诉了我这件事。例如已去世的广松涉先生的项目，即“HIRO-MATSU[名词]，新开发的日语文字处理软件。装备有日语汉字第四标准的全部功能 也有‘禁止抹泪而别’的功能 这也就是自己在制作出版物时 能避免一个单词在该行的末端和下一行的开头被分割这一现象 这也体现出广松涉这一执着的追求)”。并非没有一点局外人不理解的感觉 但也不要对“哲学”过于感激，只要能对之有一种亲近感就可以了。一边玩味语感，一边研究 真可谓一箭双雕……

罗尔斯：我不知道日文版中共收录了几个人。但在原书的第 8 版，增加了八十二个条目，总共收录了二百四十五人。

川本 其中的十三人和这次的《冒险者》条目相重复。来自于法国的有德里达、福柯、列维－斯特劳斯、拉康、梅洛－庞蒂五人。来自于德国的有伽达默尔、哈贝马斯、海德格尔三人。而且 作为英美籍的学者 蒯因、波普、库恩、维特根斯坦和您一共五人。再加上日

本读者们喜欢的几个条目。首先是“海德格尔”这个具有“为了勘探深层地质、重而不好用的装置”这样一种语义。当然这也体现出了海德格尔本人把现存在的分析作为通道，直接逼进“存在”之中这一风格。因此在“德格”(digger 即“挖掘工具”)之前加上表示高性能的接头语“High”，以显示其力度。最具有代表性的佳作要算是“哈贝马斯”了。“哈贝马斯”也是名词，通过单调的会话使人产生幻想性的宗教仪式，词源来自于德语中的“半个马克思”。

结实的钓鱼线

罗尔斯谈到哈贝马斯在他 1986 年 10 月访问哈佛大学时，我曾受到了他尖锐的批判。他说，你所依据的“重叠的共识”难道不只是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害关系吗？我看他并不只是“半个马克思”，而是完完整整的一个马克思。我也将迪内特词典中的两个词介绍给大家：第一，形容词“波普”(被解释为堂堂正正地显示出在道德上的严肃性)。波普虽以批判的合理主义为武器对待科学，但在对待政治和社会的态度上，意外地表露出他格外天真的一面，对他本人的这一天真进行了讽刺挖苦。的确，波普的理论是为了拥护“开放的社会”，而彻底打击反对“开放的社会”的敌人，但他自身也被极权主义的思维方式所束缚。而今天的我自己，并非企图粉碎反对“开放的社会”这一敌人，而是用与他们可能共有的“重叠的共识”这一概念，来为“开放的社会”进行辩护。第二，是“蒯因”一词。它是指“完全否定

事物本身的存在和重大事件的重要性”这个意义的动词。蒯因本人也粉碎了“经验主义的两个教义”。但同时，他也是顽固地支持尼克松的学者。这确实是切中了蒯殷的两面性（判若两人的蒯因）比喻得恰如其分。所以，我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川本 波普和蒯因二人都曾访问过日本 并被授予日本的相当于诺贝尔奖的“京都奖”。由此我知道了，最初拜蒯因为师的鹤见俊辅先生。他和您几乎是同一时期在哈佛大学哲学系学习实用主义。这些暂且不论，先把从德里达到蒯因的十二人按罗马字母的顺序进行排列 使他们逐个登场。但是这并等于就是把第十二个人作为背叛者犹大。名词“罗尔”可以解释为：“关于公平性的外表没有污垢的、把为数不多的直观作为鱼饵的钓鱼线。并且结实得很，即使最大的鱼或者其他不知名的大家伙 只要上了钩 就别想再脱线那样地结实。”

罗尔斯 从我的正义论来看 功利主义的嫡流新福利经济学所高举的招牌是“帕雷托最适合”它虽是表明分配有效率的指标 但对于分配的正义这一问题 却没有教给我们任何东西；即使没有人对其最合适(?)状态提出什么不满，难道就能称之为已实现了正义？关于详细内容将在本书中给予说明。迪内特之流的魔法将我改称为“钓鱼线”但比起最近出现在互联网上的和个人网页上的恶意中伤内容相比，已经算是十分不错的了。

1989 年之后

马克思与罗尔斯

川本：曾经有《高明的约翰·罗尔斯》这样的怪文章。读了该文之后，会让人觉得“罗尔斯”也只不过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名词而已。在此文中，称您为“超级反对派，而且是最令人反感的人物”，而且还举例进行了说明——“自助餐 有位妇女请求您把装得满满的土豆片分给她一半，这时要求您发表评论，您的回答是，‘那小子真像罗尔斯!’”这真是缺德的戏弄。暂且不谈这个，还是谈一谈在欧美和日本都非常畅销的哲学的空想——《索菲的世界》一书 您也是该书中的主人公之一。您知道吗？

罗尔斯：不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只读我本人罗尔斯的书”。因为，那时我正忙于《再论作为公正的正义》一书的收尾工作。所以……

川本：那是挪威的一位高中教师——约斯坦·格鲁特尔先生所写的作品，我想您可能知道。该书中关于“马克思”的一章 记述了一些关于您的情况。

罗尔斯 在发表了《正义论》的 1971 年年末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先生发表了《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该书的最后一章，谈到了对我的书的评价：“在现代哲学领域中，做出了追求社会主义伦理的正当化的最全面的努力。”而今

天 我的《正义论》一书 又成为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或者遭到那些连读都没有读完的人们的教条式痛骂。诚然 在 70 年代初期，我的著作在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中受到青睐 但如果不是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 而是自由的社会主义的话 我个人认为 我在《正义论》一书里所提出的社会构想是有可能得到实现的。

川本 无论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还是“基于所有财产分散的民主主义”，都可以满足正义的两个原则。这是您所坚持的基本观点！既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破产 所以在体制选择上 主张选择‘自由的民主主义’的论客们指责您对这一问题态度暧昧。现在，也正好借此机会，来看一看格鲁特尔先生在书中是怎么写的。阿尔贝特对作为主人公的索菲是这样解释的：

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道德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日文版中 是这样翻译的）在脑子里做着很有意思的体操。即想像你们都将成为制定未来社会的一切规则的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考虑从什么开始到什么结束的问题。一旦委员会达成共识，在规则上签字，你们就会丧命。……然而，你们将在按委员会所制定的规则运作的社会中立即获得新生。但是，你们在这个社会的什么地方获得新生呢？也就是说，你们并不知道你们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这仅仅是像在大脑中做体操那样的一种空想而已。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公平的社会吧！因为人与人之间是事先已被约

定为要彼此平等的。在罗尔斯的这种大脑的体操中，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会作为男性出生，还是作为女性出生。倘若概率是 50% 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将会按照对男性和女性都具有魅力的模式而被创造出来。

索菲听了以上一番话之后，便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好啊！真是太好了！”

天安门广场的《正义论》

罗尔斯：真不愧是格鲁特尔！确实抓住了《正义论》的关键。我并不否认我确实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我不像萨特那样的心情，认为“在我们的时代里，这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哲学”。应该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历史上曾被看作是民主主义思想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使这样，从天安门事件和柏林墙倒塌之后的 1989 年以来，也仍然广泛流行着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感叹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接受马克思的这种思想。因此，作为固执倔强的我，在哈佛大学讲授政治哲学课程时，依然对约翰·洛克、卢梭、J·S·弥勒以及马克思这四位思想家有关民主主义的思想进行了“反时代性的考察”。

川本：我知道您对早期马克思给予了相当肯定的评价。在您对《正义论》第七十九节“社会联合”所作的注解中，对马克思做了如下的肯定的评价：“成员们被自由的各种制度所制约，从而能够发挥各自的优点与

个性的‘人类共同体的理念’，并把这个理念作为探求西洋近代思想的一种方法手段，对比尔海姆·冯·芬勃尔特、康德、左拉和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了引证。就连我从朋友那里得到的您在哈佛大学的讲义资料，也记述了您在考察了‘以财产所有的分散为基础的民主主义’制度机构之后，十分赞同马克思在《关于犹太人问题》中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此外，作为日本读者代表的我，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 1989 年之后，您如何评价东欧各国反抗共产党一党独裁和官僚腐败的民主化运动？听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中，“正义”和“真理”这些概念，令参加集会的民众兴奋不已。在您的《正义论》的开头，强调了“正义”和“真理”所共同具有的非妥协性品格，我感觉到您的这一信息和 1989 年的东欧人民革命的要求之间，产生了共振与共鸣。

罗尔斯：最终还是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于 1991 年 3 月接受哈佛大学哲学系学生的采访时，有人问我“对于东欧的民主化运动，应该说您的理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您有所感觉吗？”当然，我当时的回答只能是“完全不知道”。但我知道《正义论》被翻译为德文、日文、法文、意文、西文、葡文、朝文、中文。即使听说了我的《正义论》也被翻译成俄文、匈文、波文这个消息，但由于没有得到现实的出版物，我也不能肯定。据说，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化的学生和公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相互之间传阅我的《正义论》。这当然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但不能认为我的书对民众运动

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社会正义论的目标

向市民传述

川本 那么 您的哲学 特别是社会正义论的意义 究竟体现在哪里？

罗尔斯 关于这个问题 我曾经在 1991 年被采访时 反复作了解答。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 从一般的历史观点来看 即便有了令人绝望的退步 基本上也仍然标榜民主主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正义论所应用的对象不应该是政府，而应该是全体公民。社会正义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政治的表面，而应该深入其内部 同时 为了让普通大众都能理解 并且彼此之间能够进行讨论 应尽可能运用清晰明白的语言 我认为这是最为重要的。这虽然是间接的方法 但是 如果能够成为人们所理解的理念或思想 那么 我们的社会将朝着好的方向变革。即便达不到这样的理想状态，也可防止我们的社会向着坏的状态演变。当然，并不是说社会正义的理论事先就具备了某种权威和职权。它是以获得普通大众的理解为最终目标，仅仅是多个理论互相竞争而已。判定其胜负的不是坐在某个地方的裁判官。这与鉴定科学理论的成败一样，不是由外部的裁判来判定。

川本 确实如此。那么，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

为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罗尔斯：这是由时代状况决定的。这是我可能给出的答案之一。虽说公民权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但人种差别却愈来愈大，在赞美对自由与自由主义的保卫战的口号声中开始的越南战争陷入泥潭，对七名反战活动家的镇压事件——简称为“芝加哥七人”也在法院审判中引起争论。一面反思时代所面临的困境，一面对社会正义进行考察，当时，还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书。也就是说在严重政治对立的 60 年代末期 最快出版的第一本真正的理论读物就是我的《正义论》。它对于在激烈的政治抗争之中强烈地唤起追求社会正义的需求起到了作用。我想这可能是《正义论》能那么快地获得人们注目的原因。

“哲学不是说教 而是一种活动”

川本：您对东西方冷战结束后暴露出来的种种难题是怎么认识的？如地球环境问题、民族对立的激化、美国国内的反对对少数人采取积极的歧视矫正措施、围绕文化多元主义而引起的争论、揭露歧视的“政治”运动等等。从您的“作为公正的正义”的立场出发 谈一谈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罗尔斯：我本人对以上所列出的那些问题有我自己相应的看法，这是事实。但终究是作为一个公民的应有看法 并不是从“作为公正的正义”的立场出发寻求的托词。把作为能够对所提出的全部问题进行回答的装置本身理解为关于社会正义的构想 无论是“作为

公正的正义”还是功利主义)那是非常错误的。假如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生活能够理解并加以接受,或者对社会生活感到厌倦,那么,不要把这种感受压抑于心中,而要与他人相互讨论。为此,有必要对“社会”这一居住场所进行深刻和实际的把握。社会正义论只不过是企图满足这种需要的“活动”罢了。

川本:“哲学不是说教,而是一种活动。”^[1]您能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如此坦白地说出来,看来不是在叙述“索菲的世界”,而是开始表述“您自己的世界”。从现在开始,我将按照时间顺序向大家展示罗尔斯先生的生活和思想发展的逻辑过程。在此,预先告知大家在本书的最后一节,将向大家介绍罗尔斯关于史密索尼安博物馆原子弹爆炸展览而引起的讨论所作的发言。该发言表明了罗尔斯对之所持的态度。

[1]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说》4.112。

第一章 从诞生到学位论文

——1921 年 ~ 1950 年

出生与幼年期

即使是一根草

用评传的方式追踪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并推测这一理论的射程 这是本书的首要目标。

非常幸运很容易就得到了罗尔斯的作品（除一部分辅助资料外）主要的部分用日文也能够阅读到。但遗留的问题是没有关于罗尔斯本人的历史资料。基本上没有获得关于罗尔斯作为学者，其治学态度的严谨、学识的深刻、生平以及他个人有关情况的传说。

从公开发表的关于罗尔斯的简历中所能获得的启发 是西田几多郎（1870~1945）一边引述英国批评家查里斯·L·拉姆（1775~1834）撰写的《区域随笔》，一边对自己的后半生作了传记——“假若回顾的话 我的生平是极为简单的。我的前半生是在黑板前面坐，后

半生是站在黑板前面。如果说面对黑板转一大圈，也就完成了我的传记^[1]，对这几句话不用作任何修改，一个平凡的教师的生平仿佛又重新浮现在眼前。

然而，当时的西田便立即对之附上了几句：“但是，即使明天就放进炉子烧掉的一本草稿，也仍然有其相应的来历，必然会成为一种回忆。回顾我这平凡的六十年，犹如那川流不息的流水和凡人的来去一样，没有什么可值得感慨的。”但使我的期待得以实现的却是托马斯·鲍凯（1953～）用德文写成的《罗尔斯》（1994年）一书。

鲍凯在汉堡大学研修了社会学之后，到哈佛大学在罗尔斯的指导下学习哲学。罗尔斯敞开心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家谱、幼年的记忆全部讲述给了鲍凯（因鲍凯出身于德国，写书出版也是在美国之外的缘故）。本节根据鲍凯撰写的传记，拟对罗尔斯的生平作一简要追述。

双亲与政治

约翰·鲍德利·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年2月21日生于与首都华盛顿邻接的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1921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不景气状况持续存在的一年。罗尔斯的父亲是威廉姆·李·罗尔斯（1883～1946），母亲是安娜·阿贝尔·罗尔斯（娘家姓斯坦普，1892～1954）；罗尔斯在五个男孩子中排行第二。杰克是父母双亲对他的爱称。

母方的斯坦普家族，直到祖父一代一直是巴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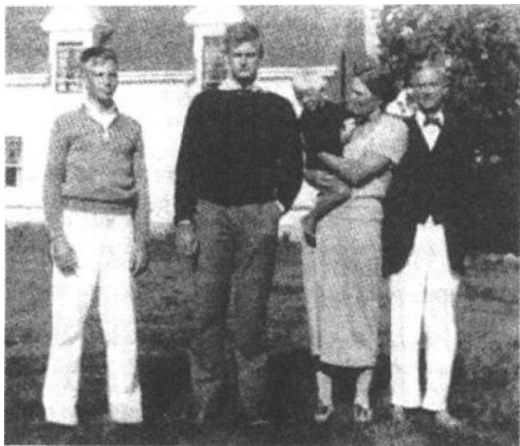
[1]《教授的退职演讲》，1929年。

摩市近郊的富豪。然而，其祖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斯坦普，因倾家荡产被迫与生下四个女儿的妻子离婚。其父方的祖父，虽然在北卡罗来纳州经营银行业，但因病于 1896 年移居巴尔的摩，在霍普金斯大学附属医院作结核病治疗。

约翰的父亲威廉姆·李，虽然也因患结核病而对人生感到苦恼，但却在律师事务所干杂活过程中，发愤自学，取得了律师资格证书。他虽是巴尔的摩一家高级律师事务所的正式职员，很年轻就具备了能在该市的法律学校执教的学识水平，作为律师获得的成功与声誉使他成为立志成才的一名传奇式的人物。

约翰的双亲对政治特别关心。担任过马里兰州州长（1924 年～1936 年）——阿尔伯特·里奇的私人顾问的父亲，曾经参加竞选美利坚合众国的参议院议员，但由于健康原因而不得不放弃。此外，父亲不仅支持伍德罗·威尔逊 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1933～1935 年 民主党 及其关于国际联盟的理念 同时还积极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 1882～1945。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1933～1945 年 民主党 实施新政，也耳闻目睹了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改组所经历的政治争论。

母亲安娜，积极参与 1920 年发起的妇女参政运动，差一点被推选为“妇女有权者同盟”的地方支部长，在周边享有很高的声誉。她还是民主党的支持者。然而，因罗斯福强行推进的改革路线受阻，在 1940 年的总统大选中改变了立场，站在了共和党温德鲁·沃尔奇（1892～1944）一边。



罗尔斯一家 左起罗尔斯、兄维利阿姆、小弟理查德
母、父

两个兄弟之死

罗尔斯的幼年时期所度过的 20 年代的典型特征，是共和党执政时期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思潮的高涨、被称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美国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伴随着汽车和收音机的普及而导致的传统价值的衰退等。但是 对于罗尔斯本人来说 最为重大的事件应该是他的两个兄弟因病死亡。

首先是 1928 年小他一岁七个月的弟弟，罗伯特·李·罗尔斯受约翰·罗尔斯的传染，细菌感染医治无效而死亡。弟弟之死对于约翰·罗尔斯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这也就成了他此后语吃症的诱因。更为严重的是，1929 年 2 月 也是由于约翰·罗尔斯肺炎的传染，1927